

今日说法

JIN RI SHUO FA 2004

CCTV 1

2004

播出时间 CCTV-1 每天 12:38

伤心日记
她为何「谋杀」自己
亡命天涯
南京同性卖淫案调查

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2

今日说法

2004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今日说法.2004.2/《今日说法》栏目组编.—北京: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,2004.6

ISBN 7-81087-758-5

I.今… II.今… III.案例-汇编-中国 IV.D920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46704 号

今日说法 2004.2

JIN RI SHUO FA 2004.2

中央电视台《今日说法》栏目组/编

出版发行: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

邮政编码:100038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蓝空印刷厂

版 次:2004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4 年 6 月第 1 次

印 张:7

开 本: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:120 千字

印 数:00001~10000 册

ISBN 7-81087-758-5/D·584

定 价:16.00 元
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由发行部负责调换

联系电话:(010)83903254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E-mail:cpep@public.bta.net.cn

www.jgclub.com.cn

中国人的法律午餐



主编：王新中 钱 蔚
编委：王新中 钱 蔚
续卫东 何淑文
刘聪毅 孙 爽
吕 莹 王冬玲
朱 凌 王亚珍
李季春
编务：赵慷简 宋 旗

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·北京·

LEGAL REPORT

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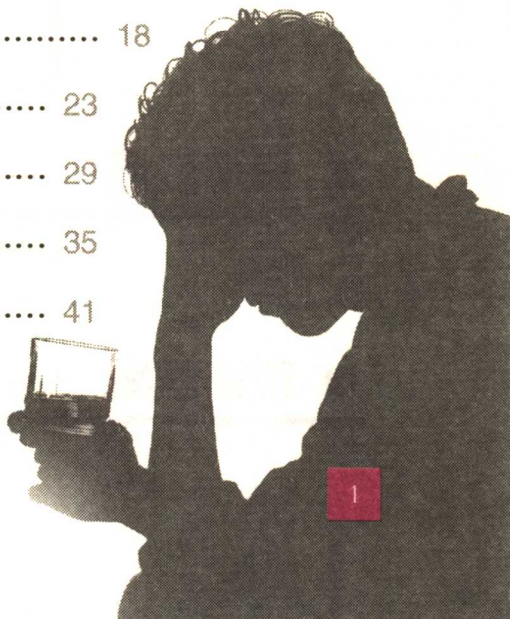
■ 记者手记



- 那年冬天那场雪 史煜国/1
- 第四个春天 王宝卿/6
- 关于焦老汉之死的那次采访 樊华伟/10

■ 案例精选

- 兵马俑发现权纠纷 13
- 南京同性卖淫案调查 18
- 亡命天涯 23
- 终结无间道(上) 29
- 终结无间道(下) 35
- 悲剧背后的深思 41
- 她为何“谋杀”自己 48
- 检疫权纷争 55



587/4

焦老汉之死

..... 61

云阳县的 120 急救

电话迷宫 6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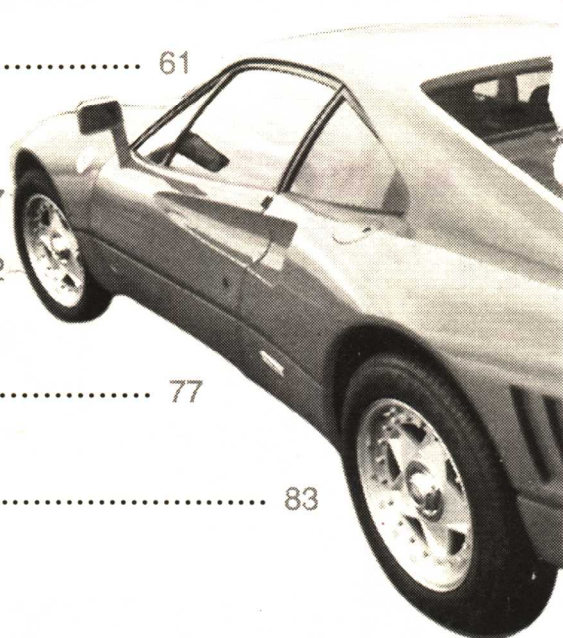
迷途少年 72

宝马之争(上)

..... 77

宝马之争(下)

..... 83



■ 幕后故事

导播台的精彩世界 张 璐/8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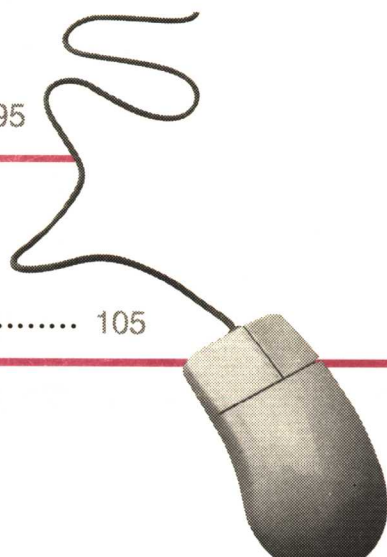
伤心日记 闫书芳/92

■ 说法咨询

..... 95

■ 说法档案

..... 105



记者手记

那年冬天 那场雪

■ 史煜国

采访了无数次,却始终难忘也不愿意提及的
是在内蒙古的一次采访经历。不仅仅因为
那是一次失败的采访。

那是 2001 年。那年的冬天格外冷。

要采访的案子是这样的:故事的男主人公
叫杨永安,46 岁,内蒙古集宁市一家摩托车修
理部的业主。由于多次拒绝缴纳房产税,集宁市

地税局依法查封了杨永安的修理部,并在他的铺面门上贴上了封条。

事隔几天后,有邻居向杨永安说他的修理部中好像有股焦糊味飘出来,怀疑里头是不是有了火情。因铺面门被查封,杨永安不敢造次破门查看,遂把有焦糊味的情况向集宁市地税局反映,希望地税局能打开房门看看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。然而集宁市地税局拒绝了杨永安的请求,执意要求杨永安先缴了房产税才能打开房门。

时间一天天过去了。一个月后,杨永安在补缴了2000元的房产税后打开铺面门发现,屋里的物品因自燃而全部被烧毁了,直接经济损失达两万元。为此,杨永安将集宁市地税局告上法庭。随后,法院以地税局具体行政行为并无不当而驳回了杨永安的诉讼请求。杨永安不服,上诉到集宁市中级人民法院,集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集宁市地税局败诉,赔偿杨永安损失费两万元。

我去内蒙古采访拍摄之前,研究了这个案子,认为是典型的《今日说法》选题,里头既有故事又有法律要点。按照惯例,我和杨永安在电话上取得了联系。杨永安很兴奋,很高兴有媒体来关注这件事情。

随后我们登上了北去的火车。由于车次没有选好,到集宁市是第二天凌晨5点,睡眠不好,我和摄像记者鄢琳都很疲惫,同时又不不好意思太早和杨永安联系,只好在候车室一直等到5:30。在杨永安用电话指引下,我们还顺利地找到他家。没想到杨家养了一条硕大的大狼狗,杨永安和他老伴热情地前挡后拦,我们才安全地进了他家。

到杨家时快7点了,屋里光线还比较暗,但打开窗户也能勉强采访。我当时困得不得了,就说过会儿天亮点儿再采访。本来杨永安已经摆好了接受采访的架势,看我那样子,也就心疼我,让我睡会儿。我就在杨家的沙发上躺下了。没想到半个小时后我醒来,杨永安却突然变卦了——拒绝采访!

拒绝的原因是杨永安的女儿回娘家,看到我们后坚决不让她的父亲接受采访,说接受采访后会招来打击报复。哦,原来是这样!我以为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完全可以说服他们接受采访,于是就像摆龙门阵一样极尽摇唇鼓舌之能事。然而,一切都是徒劳,杨永安如同吃了秤砣一样,就是不改变主意。

罢了罢了,都怪自己偷懒睡觉。看来现在是说不通了,等杨永安的女儿走之后再做工作吧。一看时间,快10点了,我和鄢琳沮丧地离开杨家,准备去啃最难啃的骨头——集宁市地税局,毕竟地税局败诉了,不配合我们的采访工作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

没想到的是,集宁市地税局很配合我们,而且很主动,真让我们感激不尽。一上午采访很顺利。

中午,我给杨永安打了个电话,问他考虑得怎么样。没想到老杨仍然是一口回绝。这个倔老杨!没关系,看来还是没想通呢。正好趁下午有时间先采访法院去回头再说。在法院的采访也很顺利。

第二天,我们先后把除了杨永安之外的所有涉案人员全部采访完,只等留出精力来啃老杨这块硬骨头。

第三天,倔强的老杨仍然一口咬定不接受采访。他还关切地告诉我,让我死了这份心。

那哪儿成!我和鄢琳再次来到杨家。就像放电影一样,我俩把第一次见面时说的话重新说了一遍,耗了近4个钟头,口干舌燥,还是不行!老杨翻来覆去还是这句话:“你们走了,他们打击报复谁管?”

这可怎么办?本来不容易采访的地税局全采访到了,容易采访的反而没采访上。情急之下,我告诉老杨:“如果地税局保证不对你打击报复的话,你会让我采访你吗?”答应得很干脆:“没问题!”

好!我硬着头皮又来到集宁市地税局,转达了杨永安的意思。地税局很大度,说:“打击报复?不可能!我们怎么会因为电视台采访,就对当事人打击报复呢?”好,有了这句话就行。可我转念一想,地税局这话是说给我的,又不是说给杨永安听的,杨永安怎么会相信呢?要不把杨永安接到地税局来,让地税局直接给他表个态。凭着如簧巧舌,终于征得地税局的领导同意了。随后,我满怀喜悦的心情给杨永安打电话告诉他这个好消息。

然而出乎意料的是,杨永安冷冰冰地对我说:“不行!”“为什么?”“这不是让他们都听我说什么样,然后再收拾我吗?”我说:“可你也不能说话不算话啊?”“啪”,对方撂了电话。

好,现在地税局也替我鸣不平了。我又计上心头:要不让地税局给出个证明,保证以后不会对杨永安和他的摩托车修理部打击报复。但我明明知道这个要求不怎么合理。还好,深明大义的集宁市地税局居然满足了我的这个无理要求,给杨永安写了一段大意是绝对不会对他打击报复之类的话,并加盖了鲜红的地税局印鉴。

怀揣着“赦令”,我请鄢琳先回宾馆休息等候消息。一看表,下午2:00,我理直气壮地赶往杨永安家,看他现在还怎么拒绝?!我就不信了!这时候,漫天飘起了大朵大朵的雪花。

这是我第三次去老杨家,奇怪的是,前两次我去杨家时,他们都主动拦住那条大狼狗,但这一次居然没人管了。我预感到了事情不妙。

果然,事实比什么都残酷。



隔着那条狗,我根本就没有办法进杨永安的屋。

杨永安出来了,就站在屋门口。我站在院墙的里头,而那条可恶的大狗就在我脚前狂吠,在汪汪的狗叫声中,我献媚地拿出集宁市地税局出示的证明,就在那一瞬间,我觉得自己鼻子一酸。

我没有说话,感觉自己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

当时有不到两米的距离,杨永安看着我并问我:“你是谁?”我说:“我是小史啊,您怎么会不认识我呢,上午还去您家的啊,我给您带来了——”说话的同时我扬了扬手中的纸。

“没用,拿什么都没用。”“砰”,杨永安使劲关上了屋门。我觉得那个关门的声音是我平生听到的最刺耳的也是最大的关门声。

当时我就傻了。我觉得喉咙里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在哽咽着。

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无助无望。觉得自己很无能,极端绝望的情绪让我难以自制。说真的,当时我觉得已经不是没采访到杨永安让我难受,那一瞬间,让我觉得所有的大门都冲我关闭了。当时我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。

我仰起头来,任凭大朵大朵的雪花扑在我的脸上。

雪越下越大,我却越走越慢。到宾馆前的小胡同时,我突然难以自制,那个小胡同没有人,我一头冲了进去,我知道我自己当时已经泪流满面了。随后,我痛快地哭出了声音,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这么脆弱。

在那个胡同里足足呆了半个小时。脚早已经被冻得麻木了。内蒙古零下二十多度的气温让泪水牢牢地冻在我的脸上,根本就不敢用手去碰。直到回到宾馆一个多小时后,脸上的冰泪才化去。一直到今天,我仍清晰地记得脸被泪水冻住的那年——2001年的冬天。

当天晚上,我们就离开了内蒙古。临走之前,我给集宁市地税局的领导打了电话,谢谢他们。

在回京的列车上,我在想:如果当时第一次看到杨永安的时候,立刻架上机器就采访,可能也就没有后来发生的事情了。都怨自己当时偷懒睡了一会儿。

此后,每当外出采访的时候,哪怕天再晚,光线再不好,我一定要先采访完之后再说别的事情。

想起了不知是哪位先哲说过:生活就像洋葱,你一片片去剥开它,终有一片会使你流泪。我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,但是,我知道,机会不可错过;一旦错过,事后你就没有办法再去挽回、再去弥补。

那年冬天。那场雪。让我刻骨铭心,铭心刻骨。

第四个春天

■ 王宝卿

经过甘家口大厦时,已近午夜,路上行人稀少,我看了一眼表:23:05。最近单位的事多,经常这个点儿回家。闹哄哄地忙了一天,现在一个人骑车慢悠悠地回家,倒是可以静一静,想些白天没工夫想的事情。正是乍暖还寒的季节,我不由打了个寒战,冷风簸动着城市特有的苦味,和几年前一样。

这是我到《今日说法》做记者的第四个年头。这几年,走了一些地方,采访了一些案子,见识了一些好人和一些坏人。许多人和事如过眼烟云,记忆早已模糊不清,但有一个人却一直很难忘掉。她就是阿七。

阿七是我从业以来采访的第一个吸毒者,也是我采访的第一个艾滋病(AIDS)患者。

那是在2002年的春天,我和几位同事赴云南采访制作一期关于禁毒的专题片。在云南省德宏州潞西市的第二戒毒所,我提出想采访一个吸毒家庭。戒毒所的花灿所长不假思索地说:“去阿七那儿吧,她家最惨。”

在一个墙皮脱落充满霉味儿的矮房子里,我第一次见到了阿七。当时她正在吸毒,衣衫不整地半躺在床上,身边点着一支蜡烛,看到有人进来,

阿七慌乱地藏了什么。

“拿出来，快点儿，拿出来呀……”在花灿所长的呵斥下，阿七极不情愿地伸出右手，包着海洛因的小纸包被攥得变了形。

“就一点点，我不吃这个，就会头痛，撞墙……”阿七似乎很委屈，小声辩解着。

这时我才看清了她的脸：眼圈泛青，两腮深陷，像是被刀刻出来似的，发黑的门牙残缺不齐，而且臂弯处扎满了针眼——一个典型的晚期“四号客”（当地人对海洛因吸食者的称呼）。

花灿所长说29岁的阿七已经有15年的“毒龄”了，是戒毒所的常客，不过现在戒毒所不敢收她了，因为她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（HIV）。

一听我们是记者，阿七突然精神起来：“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们过来……你们从昆明来的吧？我在那儿呆过好几年，瞧，这件衣服，还是在昆明买的呢。”阿七扯了扯身上已经发白的粉色裙子，“你们坐，坐，我喊我妈来。”对我们的突然来访，她并没有生气。

花灿所长从露出砖块的墙壁上摘下装有阿七照片的相框递给我看。已经发黄的照片上的阿七跟现在判若两人，脸圆圆的，眼睛大而明亮，微笑的嘴角向上翘着，样子十分喜人。花灿说阿七以前可是远近闻名的美女，追她的人可多了，现在当然是谁见谁躲了。

阿七家所在的镇子离边境不过十几里路，一过边境便是金三角地区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里的贩毒活动远比内地猖獗，吸毒更不是什么稀罕事。

阿七很健谈，看样子也还算乐观，并不回避自己的过去：“14岁那年不懂事，被几个朋友哄着就吸了，一吸上人就完了……那也还是有男的追我，有的打都打不走，现在被人传上艾滋病，没人理了，再说我也不能害人家。”阿七还说，曾经有过一个男朋友，甚至还生过一个孩子，但孩子一生下来就有毛病，被男朋友扔了。说到这里，阿七的眼神里流露出些许哀伤，毒品并没有完全吞噬掉她与生俱来的母性。

我远在家乡的姐姐同阿七年纪相仿。姐姐有丈夫、孩子和幸福的家庭。而眼前这个可怜的女人，美丽、健康、青春和爱情早已一去不复返，只有死亡的阴影在纠缠着她。我一下子联想起许多早逝的人，不禁有些惆怅，内心充满着怜惜之情。

“你不用害怕，这样在一起说话不会传染。”大约是平日被人嫌弃的时候很多，阿七见我默不作声，以为我是怕被染上病，慌忙解释道。

“哪里哪里，怕我就不来了。”我笑了笑，摊开双手以示毫不介意。其

实自始至终,我根本没考虑她是一个犯起毒瘾来面目狰狞的吸毒者,也没顾虑她是一个体内携带着致命病毒的艾滋病患者,只是觉得她是我有生以来遇到的最不幸的人之一。

阿七兄妹7人,已有4个吸毒者包括大哥、四哥、五哥和姐姐吸毒身亡;另一个兄长不愿意进戒毒所,流落他乡杳无音讯;嫂子因为贩毒被公安部门收审。阿七的母亲已经70多岁了,一只眼失明,腿脚也不灵便,太多的磨难使老人始终沉默,只是念叨了一句:“全是给大烟害的。”曾经人丁兴旺的一个大家庭,如今只剩下悲哀无助的老母亲和被死亡阴影笼罩的小女儿。过分凄惨的境况使母女俩已无需在外人面前遮掩自己寒酸的生活。几年前,一场大雨淋塌了房子,没钱修缮,她们只好住在自家的牛棚里,靠在房前屋后种菜为生。

“只能过一天算一天了,反正也没多久了,其实我只是为了陪我妈才活着。”阿七说最近她常莫名其妙地上吐下泻,吸毒加艾滋病,估计活不了几天了。这时在一旁捡菜的阿七的母亲插了一句:“死了都轻松,干脆死了还好。我整天提心吊胆的,烟瘾发作起来,父母都不认了。”听了母亲的话阿七不再作声,低下头笑了笑,脸上似乎有些愧疚。我的心突然一沉,对阿七说不好是愤恨还是同情。

我提出要给她们母女拍张合影照片,阿七兴奋起来,说好几年没照相了,跑着回房间去化妆了。在母女俩赖以遮风避日的屋前,我一连拍了好几张,生怕照不好。我知道这也许是她们母女最后的合影。一个月后,我将洗印好的照片寄给她们,没有回信,也不知道她们收到没有。

离开阿七家时,下起了雨,阿七的母亲一拐一拐地忙着给我们找雨伞。我们的车开远了,我回头看见母女俩依旧站在路口……

这以后,我又见到过许多不幸的人,听说了许多不幸的事。

2003年的春天,我在北京采访外来民工子女的就学状况,亲眼目睹了许多外来的农民工,为供子女读书(外来学生须交高额借读费)怎样忍气吞声地辛苦劳作。收容制度废除后,乞丐似乎多了,我每天在回家的路上都能碰上蓬头垢面的行乞者或是拾荒者,他们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的样子使我难以忘怀。有一张照片拍的是一个年轻的贵州背煤工的形象,据说他从矿井口背一筐40公斤重的煤,走1公里山路才挣1块钱。还有那么多赢理不赢官司而背着铺盖卷上访的人们……不知什么原因,一看到这些人,一听到这些事的时候,我总会联想起阿七。在我的脑海里,他们本质上是一样的——都是不幸的人,只是不幸的情形各不相同罢了,而阿七的悲惨的样态就是他们的符号,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中,挥之不去。

朋友开玩笑说:我们自己已经很幸运了,长这么大没赶上战争和地震,没遇上大病大灾,没成为孙志刚,没看病被治成植物人,没进私企打工被轧断胳膊腿儿……

是啊,我们有体面的工作和不薄的收入。我们有太多值得庆幸的地方。可我却一直难以找到比那些不幸的人过得更好的理由——人本一样来到这世上的。切·格瓦拉说:我怎能面对别人的苦难背过脸去。我也不止一次地问自己:我能为他们提供怎样的帮助?诚然我们还没有树立起一种壮士断臂的坚定信念,也还没有这种果敢和勇气,但我们仍需从一点一滴做起,尽力而为。因为我们在同一个国家生活,我们是同胞。同胞的苦难和不幸说到底也是我们的苦难和不幸,我想我的许多同事也是这样认为的吧。

两年过去了,也不知道阿七怎么样了。也许她早已离开了人世。我记起一句话: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,每个人的死都是我们的一部分在消亡。

转眼2004年的春天到了。在我的记忆里,春天总有许多新的事情发生,但愿2004年的春天发生的多是好事。



周一的选题会上有人汇报说：陕西西安郊区有一村民——50岁的焦老汉承包土地后种果树，10多年后被村里单方面中止合同，毁掉了正在挂果的林木。焦老汉找村里说理不行就将村委会告上法庭，法院判决村委会赔偿焦老汉损失。但是，过去3年了，赔偿一直执行不了，焦老汉一次次讨要赔款无果。2003年因为去村主任家要钱还被打了一顿。这位焦老

汉精神受到极大刺激，之后话语越来越少。2004年2月26日，焦老汉含恨自尽于家中。这则消息来自于当地的一家报纸。听完汇报，各位制片人各抒己见：做还是不做？做吧，在《今日说法》节目被“灭”掉的片子中，数农村题材的最多，而且农村基层情况复杂；不做吧，焦老汉就这样死了，《今日说法》不发出自己的声音，有些对不住广大的农民兄

关于焦老汉之死的 那次采访

■ 樊华伟

弟们。最后总制片人钱蔚拍板：做！派两个人快去快做。我表示愿意去。后来有领导说没想到一向对公安、刑事题材感兴趣的樊华伟这次竟然选择了一个农村题材！我自己也觉得缺乏这方面的经验，领到选题后一方面抓紧联系落实出差的各项事宜，一方面抓紧请“老”领导孙爽谈了谈她当年下农村采访几次被地方领导“围追堵截”时，她就“敌”进我退、“敌”退我进的经历。有了同事们给的这些“酒”垫底儿，我在第二天交接完上一个片子后和摄像记者张维桐一起上路了。

一上火车，与我们临铺的一位40岁左右的干部模样的人看到我们的摄像机等设备，友好地与我们交谈起来，问我们：是中央台的吧？哪个栏目的呀？到西安吗？采访什么呀？我笑嘻嘻地答道：“十套的。别的问题嘛我们单位有纪律不能说！”内心里我却

